

国史纪事本末

(1949-1999)

第四卷

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下）

主编 魏宏运 祁建民 撰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国史纪事本末 (1949—1998)

第四卷 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下)

祁建民 撰

辽宁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七千人大会	1
加强中央经济管理权	21
“八字方针”的贯彻与实施	35
凭票供应	47
毛泽东等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57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72
“文化大革命”前的“上山下乡”运动	82
全国人大恢复活动	94
全国政协恢复活动	105
调整统战政策	117
“反修防修”理论的提出	126
《刘志丹》事件	134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40
粉碎美蒋反攻大陆军事行动	150
中日外交半官方关系的确立	156
提倡计划生育	167
学习雷锋运动	175
农村“四清”	182
城市“五反”	201
刘少奇出访印尼等国	212

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	220
中苏大论战	237
桃园经验	254
工业学大庆运动	267
大比武	279
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十三国	288
中法建交	294
全国学习解放军	301
农业学大寨运动	312
教育改革与教育革命的提出	319
加强战备工作	339
两种教育制度的实行	349
《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	355
“三线”建设	362
试办托拉斯	374
烟草、盐业托拉斯的成功试办	392
“两弹”研制成功	405
四届政协组成	416
三届人大提出“四化”目标	422
“突出政治”	429
援越抗美	439
西藏自治区成立	446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457
学习焦裕禄	468

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1958年以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参加会议的除中央、中央局、省市县委、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外，还有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及解放军方面的负责人共7118人^①，史称“七千人大会”。

自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左”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越来越严重。“共产风”、浮夸风、对生产瞎指挥、强迫命令的做法盛行，严重破坏了生产力，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曾努力纠正这些错误，却由于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批判，造成中共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使之未能得到及时纠正，反而变得日益突出。1959年遇到自然灾害、苏联停止对华援助、撤走专家，更使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此时，一些国外敌对势力利用这种暂时困难，大肆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中苏两党关系日益恶化，“大跃进”也是苏共攻击中共的一个口实。台湾国民党当局猖狂叫嚣反攻大陆，国内一些敌对势力乘机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这些状况使得人们在分析和认识国内局势时更加感到复杂和困难。

面对这种状况，毛泽东的基本看法是：

（一）感觉去年（指1960年）、前年心情不那么愉快，究竟国内形势怎样？做一个总分析，还是不错的。今年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六十条”一搞，最近把队为基础更进一步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见效了。

（二）关于对过去几年如何看。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得好事是基本的。有些缺点错误，我们也把它总结起来了，好的成功的、错误的统统总结起来了，就变成了财富。然后，我们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事情就会办好。

（三）关于责任。毛泽东责成中央书记处将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作一研究，中央书记处编了毛泽东讲话和中央指示两个本子，认为前者没有错误，后者毛病很多。毛泽东说，有些问题是部门、地方的主意，为什么中央听呢？他认为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

（四）毛泽东对邓小平讲，就是要不断革命，一个任务完成了就要提出新任务，要不然灰溜溜的。

毛泽东还提出，明年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要大抓一年，几个方面都要理出头绪来，都要“跃进”。

总起来看，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比较乐观，他不掩饰前几年的错误，并认为错误的责任，首先在中央。

“七千人大会”就是按照毛泽东以上的思路组织召开的。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月11日开幕到29日上午，主要围绕刘少奇所作的《书面报告》进行讨论、提出修正意见；第二个阶段是从毛泽东1月30日下午讲话到会议结束，

是开“出气会”，深刻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全党思想得到进一步的统一。

会议第一阶段是讨论、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同时联系实际检查几年来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开展专题讨论，反对分散主义。刘少奇主持了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反复讨论，征求大家意见又提出《书面报告》的第二稿，最后根据毛泽东1月30日讲话的精神修改后，作为会议正式文件下发。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国内形势和面临的任务，总结经验教训；第二部分讲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告诫全党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问题；第三部分讲党的工作，强调了实事求是的作风，走群众路线，改善党内生活等问题。

《书面报告》列举1958年以来的各项成就之后，总结了这几年的主要缺点和错误，这包括：“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②刘少奇还说：“对于

这几年来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

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时，《书面报告》提出以下十六个方面亟须注意，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要保持适当比例关系，既要考虑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又不能超过实际的可能性，不能要求过多过急；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民主和集中是互为前提、互相依赖、互相渗透的，是不可缺一的。既要发扬民主又要反对分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不论是革命斗争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同样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自力更生，必须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起强大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的；必须实

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在会上引起热烈的讨论，有人基本赞成，也有许多人提出不同意见。其中主要集中在对形势的估计、产生困难的原因和错误的责任等问题上。

关于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许多人仍十分乐观，认为形势已基本好转，“五八年的劲头又起来了”，“生产高潮正在开始到来”，过两年又“可以组织新的跃进”。有人认为《书面报告》“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书面报告》关于1963—1972年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的设想、任务提得太低。在《书面报告》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中，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对报告中关于形势的分析和今后的任务表示不满，提出一连串问题：“《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指标要不要？”并且说：“越看越没劲。”^③

关于产生困难的原因，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④当时会上仍然有些人强调自然灾害是主要原因，不承认或不完全承认在主观领导、政策上的失误。

对于错误的责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明确提出责任首先在中央，其次是省及以下的各级党委。在讨论中，有人出于对领袖的敬仰反对由中央承担责任，特别是反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人有失误；有人则出于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提出产生错误不能由毛泽东负责。在1月18日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发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

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邓小平插话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次日，陈伯达在会上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彭真解释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⑤。

在分组会上议题还涉及“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及对“三面红旗”的评价。大家认为，分散主义主要体现在急功近利，指标过高，基建乱上马，战线拉得过长，盲目扩大城市职工。许多地方的领导无组织纪律，甚至搞独立王国，对中央封锁消息，甚至抗拒检查。分散主义的原因既有“条条”与“块块”分割的原因，也有党内生活不正常的原因，一般党员不敢说真心话，主要是怕丢了党票，丢了官。对于“三面红旗”的评价，大多数代表是肯定的，有些人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在“三面红旗”指导下，我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绩，对其应从整个历史时代来估量，而不应从局部或从短时间的状况来评价。也有的代表提出：“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但具体问题

就不好说了，并将具体问题归纳为七点：一、跃进还是没有跃进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二、如果说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粮食、市场紧张；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减产了，对“大跃进”怎样理解；四、高指标、大规划是不是执行路线的错误；五、路线是正确的，为什么有些错误和缺点会形成全国性的；六、有些事情“大跃进”了，有些并没有“大跃进”，怎样看才是正确的；七、现在工业调整，农业恢复，能不能说还在继续跃进^⑥。

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1月27日下午，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常委在全体大会上作口头报告，刘少奇的口头报告，较之于《书面报告》在许多问题上更加客观了。

关于对当时经济困难的估计，刘少奇说：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前，我们原来认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关于产生困难的原因。刘少奇说：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

还有一条，就是从 1958 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主要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关于成绩与缺点的比重。刘少奇说，从 1958 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毛泽东插话说：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区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有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

刘少奇还谈到人民公社问题。他说，我和农民谈过话，农民对于初级社很高兴，谈起来眉飞色舞，可是谈到高级社就不那么高兴。不办公社是不是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问题是已经办起来了，还是应该逐步把它办好。现在，人民公社只能搞这么多优点，再多的优点现在搞不成。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刘少奇还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会议进行到此，一切顺利，全体与会人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问题的认识愈加深。这时，林彪出于自己的阴暗心理却在大会上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讲话。1 月 29 日，林彪在大会

上发言，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党的工作，一个是关于军事问题。

林彪在发言中首先说：“我们党，做了很多的工作，做了伟大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他说目前的困难“无论如何是暂时的，肯定是暂时的，而且目前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今后必然会继续好转下去。”“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他提出造成困难的原因是由于没有经验，“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有极少数干部是坏的”。这几年物质方面有所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可见，林彪的以上认识是浮浅的，并尽量减轻对困难的认识，这与会议上认真严肃的气氛是不一致的。

林彪将“大跃进”以来存在的困难归结为是由于没听毛主席的话造成的，以取悦于毛泽东。他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林彪接着说：“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

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林彪的发言在会上未取得很大的反响，却为他此后的升迁捞到一笔资本。会后，毛泽东在这份发言的批语中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泽东还说：“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做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⑦

从毛泽东1月30日讲话开始，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毛泽东的讲话包括六个方面，即这项会议的开会方法，民主集中制问题，应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其“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⑧。

关于这次会议的方法。毛泽东说：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

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

毛泽东重点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我们有些同志，对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毛泽东接着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的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

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毛泽东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惟一的方法。他说，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1959年就开始做自我批评，晚的，也在1961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做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做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做检讨，晚做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在谈到集中时，毛泽东说，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讲集中问题时，毛泽东特别批评了在领导班子中第一书记专断的错误。他说：各种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算就算数的道理呢？……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么，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

令与会者最为感动的是，毛泽东带头在讲话中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

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面对当时国民经济遇到的严重困难，毛泽东从认识论的角度启发大家，从辩证的角度观察当时存在的问题，以便树立信心，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克服困难。

毛泽东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